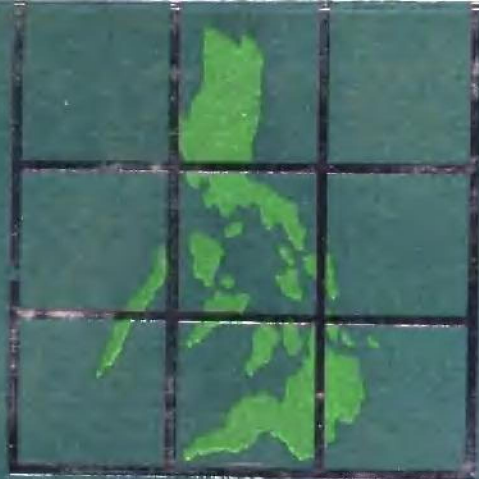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菲律宾史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金应熙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菲 律 宾 史

金应熙 主编

刘迪辉

何安举 编著

金雨雁

河南大学出版社

851

菲 律 宾 史

金 应 照 主 编
责任编辑 戴可来 刘小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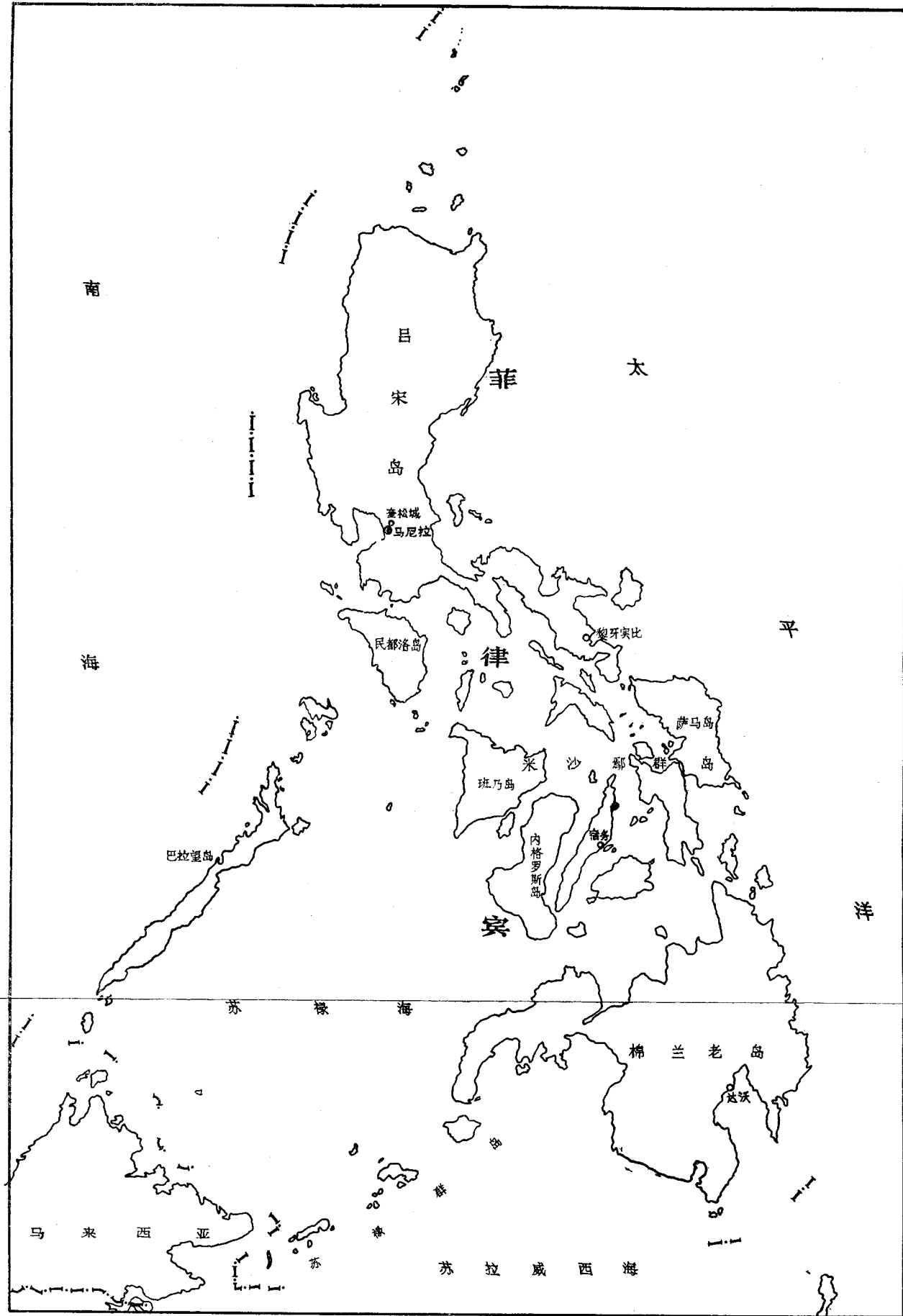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27.375 字数: 70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平)5.90元
(精)8.90元

ISBN 7-81018-393-1/K·51



菲 律 宾 地 图

导 言

菲律宾，全称菲律宾共和国，位于西太平洋赤道与北回归线之间，是一个资源丰富，地位重要的东南亚国家。全国共有大小7,100多个岛屿，但是有人居住的仅1000个左右。全国土地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最大的10个岛（吕宋、棉兰老、萨马、内格罗斯、巴拉望、班乃、民都洛、莱特、宿务、保和）共占总面积的92%。地形多山，有火山50多座，其中全菲最高峰的阿波火山在棉兰老西部，海拔2,953米，而吕宋岛东南部的马荣火山，则是境内最大的活火山。也有不少的平原、河流和湖泊，最大的平原在吕宋岛中部，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是著名的菲律宾粮仓。海岸线长达18,500多公里，有许多良港，海上交通运输比较发达。因地处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在2000—3000毫米之间。由于雨量充足，土壤也肥沃，作物可全年生长，故农业发展潜力很大，据估计可供应8,000万人口之需。全境覆盖森林面积约40%，木材供应充裕，矿产也相当丰富。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良好资源条件。菲律宾北与我国台湾省相望，南与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隔海相对，西濒南中国海，东临太平洋，正当亚、澳两洲大陆和太平洋之间、东亚和南亚之间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菲律宾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在近代的反殖、反帝斗争中双方的友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1975年中、菲建交以来，邦交和睦，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都迅速开展。

对于这样一个同属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列的友好邻邦，我

们应该认真研究她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值得菲律宾人民引以自豪的。他们早在公元初年就已创造了相当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还同中国、日本、印度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16世纪以后，他们先后对三个大国（西班牙、美国、日本）在菲建立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时间长短不同的斗争，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经历了近四百年可歌可泣的奋斗，终于在1946年赢得了独立。独立以来，菲律宾已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获得可喜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上也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虽然这个新兴国家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人民革命受到挫折，经济发展速度也还未如理想，但是可以相信，随着菲律宾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必将得到完满的解决。对光辉而又丰富多彩的菲律宾历史进行深入的探索，说明其发展演变的规律，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的，是我国世界国别史研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同菲律宾历史一样，对菲律宾史的研究也经历过一个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到19世纪80年代，菲史研究还只限于西班牙教士和殖民官员少数成见很深、学术价值不高的著作，而100年后的今天，菲律宾历史编纂学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现在，从菲律宾史前史到当代史，从马尼拉到群岛每个省区的地方史，从通史到各个领域的专史，研究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进展最为显著的年代是从1960年至今的1/4世纪。在我们开始叙述菲律宾历史之前，先简单回顾一下菲律宾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和演变，是适时和有益的。

最早的菲史著作写于17世纪，多是西班牙教士和殖民官员的手笔，如阿杜阿特（Diego Aduarte）关于多明我会的历史和莫尔加（Antonnio de Morga）的《菲律宾群岛志》等。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如莫尔加书）保存了对菲律宾和其人民的较为客观的纪述，至今尚有参考价值，但是大多数都带有浓厚的种族偏见，经常歪曲事实真相。后来黎萨就曾指出：阿杜阿特是个半殖

民军士兵、半教士的冒险家，在派出其同伴去杀死安睡中的菲律宾人以前不曾忘记听他们的忏悔^[1]。另一名教士加斯帕尔（Gaspar de San Agustin）在所著《菲律宾群岛之征服》中诬蔑菲律宾人怠惰、无恒，同中国人一样都是劣等民族。这本书里有许多歪曲史实的地方，后来已有人驳正^[2]。在内容上，西班牙人写的这些初期菲史多是叙述殖民统治和修会活动，甚至集中讲某一个修会，狭隘琐碎，遭到非议。到18、19世纪之际，才出现了一些比较全面的菲律宾通史，如德·拉·康塞普西翁（Juan de la Concepcion）14卷本的《菲律宾通史》和苏尼加（Zuniga）的《菲律宾群岛史》^[3]。

19世纪后半叶，在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期中，不少西班牙人的菲史著作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为西班牙殖民统治辩护，还对菲律宾人民进行侮辱，例如巴兰特斯（Vicente Barrantes）的《泰加洛戏剧》一书就否认在西班牙侵入前的菲律宾文艺有任何独创性，妄说天生怠惰的菲律宾人毫无智力，菲律宾的一切文明都来自西班牙。这种殖民主义观点受到黎萨的有力抨击。他于1888年在伦敦英国博物馆钻研莫尔加书的原刊本，随后加注刊行，希望通过对菲律宾古代历史的研究来唤醒同胞的爱国心。他在该书的题词中写道：“如果这本书能在读者心中带来对我们那已被遗忘的过去的鲜明印象，纠正谬论和污蔑，那末我的工作就不会白费，以此为基础，我们就都能致力于研究那些与我们前途大有关系的问题。”^[4]不久以后，黎萨又在《团结报》上接连发表论文，引据我国史籍《诸蕃志》的纪述及其他史料论证菲律宾人早就是有道德、有文化的民族而且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驳斥了菲人天性怠惰和西班牙把文明传播到菲律宾等荒谬论点^[5]。现在看来，黎萨对西班牙侵入前菲律宾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估计或稍为偏高，但其论述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奠定了以后菲律宾民族主义史学的基

础。

对于西班牙殖民主义历史编纂学中的种种偏见，现代的非史学者已有较充分的认识。有一本书题为《羊皮幕上的裂痕》，把殖民主义史学比喻为羊皮幕，要透过幕上出现的裂缝才能窥见菲律宾历史的真相^[6]。但是，对于美国殖民主义历史编纂学，人们的警惕就没有那么高了。正如R·康斯坦丁诺（Renato Constantino）所说：“大体讲来，菲律宾的历史学家在改正从西班牙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若干偏见，使菲律宾人民在思想上得以从传教士历史编纂学的沉重传统下获得解放这个方面，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美国殖民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强烈的残余影响。”^[7]这里所讲的美美国殖民主义历史编纂学，所指是美国侵入菲律宾后20世纪初年一些美国高级殖民官员（如E·武斯特、G·马尔科姆、J·海登等）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学术水平一般说来要比西班牙殖民者所写的书为高，但因它们所担负的是为美国对菲侵略政策涂脂抹粉的任务，所以羊皮幕的比喻对他们也是适用的，历史的真实往往要从字里行间甚至从纪述的反面去捉摸。这种殖民主义史学的常用手法之一，就是将美国统治政策同西班牙的对立起来，在揭露西班牙露骨而且落后的掠夺政策的同时宣传美国政策的开明性。在其影响下，关于西班牙殖民制度的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有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问世，如舒尔茨（W. Schurz）的《马尼拉大帆船》等，而关于美国在菲殖民统治有分量的好书就少得多了，比如美国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活动在美国侵占菲律宾中的作用，这个重要问题直到70年代初的一些专著中才有比较深刻的阐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菲律宾同东南亚许多国家先后获得独立。对东南亚各国历史的研究随着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过去一些著作中以宗主国和殖民主义者的活动和成就代替各殖民地国家的历史，这种做

法遭到了批判与摒弃“再不能将18世纪的印尼史写成荷属东印度公司史了”^[8]。这种对欧洲中心论的否定成为新一代东南亚史研究工作者的基本信条。与此同时，国际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东南亚史的学术队伍也在壮大，而且取得不断增多的成果。这一切对菲律宾的历史学界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

从自治时期起，菲律宾政府就很重视加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作。自治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教学内容中增加对菲律宾民族英雄及其事迹的讲授，藉以灌输民族主义思想^[9]。独立以后，菲律宾政府又于1956年根据民族主义政治家雷克托（Clara M. Recto）等人的倡议，不顾天主教团的激烈反对，通过了共和国第1425号法案，规定全国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均须开设关于黎萨生平及其著作的课程，并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尽管菲律宾国内外都有人认为法案对讲授和研究重点的选择表明菲政府倾向于渐进的改良，因而对法案仍有不满，但是，菲政府如此重视菲律宾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历史，这无论如何总是对于殖民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一次有力冲击^[10]。

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促进下，民族主义史学自50年代末在菲律宾兴起。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贡西洛（T. Agoncillo）所写的《群众的起义》同《马洛洛斯：共和国的危机》于1960年出版，这两本书对1896—1902年菲律宾革命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他著作，如马胡尔（C. A. Majul）关于马比尼和格雷罗（Leon M. A. Guerrero）、关于黎萨的研究等，也随后相继问世。这些民族主义史学家所提出的“通过菲律宾人的眼光来观察菲律宾历史”，初时曾被讥为“猎奇、非正统和大胆”，但是他们的主张很快受到群众的肯定。阿贡西洛与人合著的《菲律宾人民史》在10年中印行三版，被很多学校采用作为教本。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一成功，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它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坚持以菲律宾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作为贯串全部菲律宾历史的

主线，从而力图肃清殖民主义在菲律宾历史研究中的影响，给人以菲律宾史学界面貌一新的感觉。其次，在研究范围上，民族主义史学较前人有所扩大，对于过去研究不足或在殖民主义史学著作中作出别有用心解释的题目，特别注意，如：西班牙侵入前的菲律宾社会，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对美国统治的反抗等。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如阿贡西洛）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定影响，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他们重视新史料，比较充分地使用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档案。他们的考订是有史料根据的，但又不流于罗列大量史料。他们的基本结论在学术上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能为后来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民族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

进入60年代以后，菲律宾历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在迅猛的发展中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些不足之处也容易暴露出来。

第一，偏重政治史而忽略社会史和经济史，这是过去有关菲律宾的历史著作中的突出问题，民族主义史学对此也未很好解决，仍然较多研究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德·拉·科斯塔（Horatio de la Costa）曾于1961年论及此点，呼吁开辟政治史以外新的研究领域。他指出，一方面当时对于黎萨生平的一些细节有人连篇累牍地进行探究，而另一方面对烟草专利权这样一件菲律宾社会经济史上的大事，研究却停留在19世纪时的水平，毫无进步，这种状态应该改变^[11]。拉金（John A. Larkin）则认为：由于菲律宾社会主要是农村社会，而且西方国家中那种大城市支配农村的情况在菲律宾并不存在，菲农村社会发展中内部的社会经济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特别重视研究菲律宾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史^[12]。

第二，由于偏重政治史，自然着重注意作为全国政治中枢的首都马尼拉和附近地区，而对于群岛各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就比较忽略了。1967年，拉金在《地方史在菲律宾历史编纂学中的地

位》一文中,讨论了过去菲律宾历史著作(包括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一缺陷,认为过去被描述为菲律宾史的,往往只是马尼拉及其周围这个小地区的历史,而所谓全国性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则仅仅反映这个小地区的社会文化特点。拉金还提出,菲岛各地区在社会发展上是有极大差异性的,所以目前研究菲律宾史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以社会史的角度对各区作个别的深入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一步,才谈得上写作真正综合性的菲律宾全国史^[18]。

第三,民族主义史学在批判殖民主义观点时,有时会流于片面和简单化。《菲律宾人民史》中曾说1872年甲米地起义前的菲律宾史“主要说来是一部失落了的历史”,并且认为西班牙在菲的三百多年统治只能属西班牙史的范围。这种论点当时虽有摧陷廓清的作用,但是话说过头了,把菲律宾历史中的重要段落说成是殖民主义国家的历史,就不对了。康斯坦丁诺说得好:“一部菲律宾史无须涉及那些只与西班牙人有关的史事,这是真的,不过从一开始西班牙殖民政策(甚至还有西班牙历史和社会的某些方面)却是对发展中的菲律宾社会有深远影响的,我们不应予以忽视。”^[14]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菲律宾史研究工作者在70年代初积极开展了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地方史研究活动。拉金的《邦板牙人:一个菲律宾省份中的殖民地社会》一书出版于1972年,为使用菲律宾国家档案馆所藏文献来研究各地区社会经济史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随后的十年中,有关菲律宾各重要省区的地方史专著纷纷问世,连同一些尚待刊布的学位论文在内已达20种左右,其中不乏颇有分量的力作。作者中以美国和菲律宾的学者居多,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大学里接受专业训练的。为了推动地方史研究,在一些地区或城市里成立了地区研究中心或历史委员会(如宿务研究中心等),还有些地方出版了地方史专门刊物,如1970年创刊的《北吕宋学报》。

这一批地方史专著之得以完成,同菲律宾国家档案局从60年

代晚期起开放19世纪各省地方档案很有关系。这些专著在使用史料上有其特点，即除政府文告和官员信件等全国性史料外，更多地使用了带有浓厚地方性的史料，如各地教区纪录、人口调查表、土地契约、税册等。要好好整理、分析这类史料并从中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就必须进行多科性的研究，借助于历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他部门（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在非史研究中首先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的是魏安国(Edgar Wickberg)的《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965年出版)。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法院档案和纳税纪录，从中探索华人和华菲混血儿(Mestizo)的社会地位及其变化，取得了良好成绩。到70年代前期，终日埋首档案局中的史学家日渐增多，还有大规模整理地方史料的计划，如有人自1971年起组织力量对全菲所有地方天主教堂所藏总量达2500万页的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工作已接近完成，预计对于了解全菲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型式，对于分析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都会有大帮助^[15]。

由于使用了新史料和新方法，地方史写作就能对菲律宾史（特别是19世纪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起较大的推动作用。一些重要的专题（如农业商品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关系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研究得更深入了，过去比较忽略的关于穆斯林社会和北吕宋山区的研究更是大大推进了一步。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上，地方史专著也有不少新的创获，如M·格雷罗(Milagros C. Guerrero)对菲律宾革命期间各省区上层社会的动态研究得很详细，为研究这场革命开辟了新的路子^[16]。在文化思想史方面，殖民时代留下的史料较少，往往要依靠当地的口碑和传说，因而研究者必须具备当地语言的丰富知识。这一领域内也有一些优秀的著作，如伊莱多(R.C. Iletto)的《巴西昂与革命》，从农民思想和民间信仰对1840—1910年间的菲律宾群众起义作出新的解释，有开创研究新局面的作用^[17]。

在拉金倡导地区研究的时候，他把研究地方史同编著菲律宾通史对立起来，并且把后一任务的完成放到遥远的未来^[18]。这种看法未必是恰当的。在地方史研究的高潮中，菲律宾国内外都有一些史学家继续从事综合的研究，写出一些质量较高的菲律宾通史（康斯坦丁诺1975年的著作便是其中之一）。到80年代初，连地方史研究队伍中也有概括和综合的要求了。人们担心，如果一味继续强调个别的地区研究而完全忽略综合的话，菲律宾社会史将会“淹没在一个新式古董的泥沼里”^[19]。他们希望及时运用已经整理的大量史料来解决诸如社会变迁性质等大问题。1982年出版的《菲律宾社会史：全球贸易和各地方的转变》，是由麦科伊（A.W.Mccoy）和德·赫苏斯（C.de Jesus）合编的一本论文集，执笔者都是研究地方史成绩显著的史学家。这本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当前菲律宾地区研究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概括和综合分析的一次尝试。

50年代后期以来，菲律宾史研究不但在本国国内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国际上也受到许多国家史学界的重视。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首数美国，其次是苏联和日本，还有西班牙、澳大利亚等。

在美国库藏有丰富的菲律宾资料，这为开展菲史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国会图书馆收藏的20世纪和西班牙统治期间的菲史料最多，而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则以所藏西治时期文献和菲律宾语言史材料著称。除芝加哥设有菲律宾研究计划（Philippine Studies Program）外，美国一些大学所设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如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计划中心、密执安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中心、伯克利加州大学东南亚研究资料中心等，也相当重视对菲律宾史的研究。一些著名的东南亚史学者，如本达（Harry J. Benda）、卡欣（George Mc T. Kahin）沃尔特斯（O. W.

Wolters)等,虽并不专攻菲史,但是他们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研究方法却对美国的菲律宾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由美国学人完成的,比较成功的菲史专题研究可举出费伦(J. L. Phelan)关于西班牙统治方式,斯托特文脱(D. R. Sturtevant)关于人民起义,戈莱伊(Frank H. Golay)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等许多专著,至于拉金等人在倡导菲地方史研究中的作用上边已说过了。对于菲律宾国际关系,特别是菲美、菲日关系,美国史学界也有不少人从事研究,出版了一些颇有分量的著作及论文。

苏、日两国史学家在历史观和研究方法上迥然不同,但是在菲史研究上却都有迅速的发展。在苏联东方学中,菲律宾学是年轻学科之一,它的奠基人古柏尔的主要著作《1898年菲律宾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是在1948年初版的。起步虽然稍慢,但到50年代古柏尔的门徒们跟随他的研究方向分头深入,迅即迎头赶上。列文逊、列夫顿诺娃、巴雷什尼科娃、茹列夫等陆续写成了菲近代史、现代史、经济史、工运史等方面的许多专著,建立了系统的菲史研究。到1979年,列夫顿诺娃还完成了《菲史简编》这部通史性著作。近年来苏联菲史学家更重视加强或填补过去研究中的薄弱点和空白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关于社会思想和宗教,他们除在近、现代史著作中分别加强有关内容外,还有别尔津等人写了专著。至于日本的菲史研究,在第二次大战前也是薄弱的,仅有岩生成一、箭内健次等少数人进行研究,主要限于探讨日菲(其次中菲)关系和西班牙殖民制度。自5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队伍成长起来,发展才大大加快了。除几本通史外,在土地制度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吕宋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等方面出版了泷川勉、谷川荣彦、高桥彰等人的专著,还有池端雪浦关于菲史若干重要问题(巴朗圭社会、农民起义、宣传运动、菲律宾革命、日本占领时期)的专题研究论文,多是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颇有功力。

战后苏日两国非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在课题选择上都着重当代史并且注意结合本国的现实需要，在研究队伍培养上分工都比较细致，研究人员专题深入，长期钻研，易见成效等。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苏、日的非史学家都很注意了解非本国内的非史研究动向并且吸收其研究成果。列夫顿诺娃、池端雪浦等人曾到菲、美留学专攻菲史，其他学者也多曾到菲进行学术访问，池端在研究“宣传运动”时还由日本政府帮助安排到西班牙搜集和阅读档案。这些频繁的学术交往，无疑对两国非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面提到苏联学者重视对菲律宾社会思想的研究，其中就有菲律宾本国史学的影响。

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历时三百余年，两国学术关系至今仍颇密切，研究非史的西班牙史学家亦不乏人。在西班牙南部塞维利亚市的档案库（Archivo General de las Indias）里藏有丰富的西治时期菲岛史料，曾任该库图书馆长的迪亚斯·特雷邱埃洛女士（Lourdes Diaz-Trechuelo）曾据库藏及其他史料对18世纪菲律宾社会经济作了精详的研究。澳大利亚与东南亚邻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澳洲学府对东南亚诸国包括菲律宾也重视研究，如上面所举的《菲律宾社会史》一书的两位主编之一麦科伊即是悉尼市新南威尔士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该书13位作者中即有4位在澳大利亚执教。

我国对非史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出版过《菲律宾史》等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续有发展，现在北京、厦门、昆明、广州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不少同志研究，各有成就。但是，由于正当菲律宾史研究在国际上昌盛发展之时我国经历了十年动乱，研究工作深受影响，对外学术交流陷于停顿，致使这一学科的发展还落在苏、日之后，不论在通史的编著还是在专题研究上都稍逊一筹。本书编写组同仁在工作中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近20年来国外关于菲史的许多重要论著我们一直难以配

全，至于库藏于菲律宾、西班牙、美国一些地方的大量史料则限于各种条件和我们自己的语言知识，更谈不上运用了。我们深信，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迅速进展，这种落后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变的。我们愿意以这本粗浅的小书作为基础，继续努力，追随研究菲史的各地同志之后，在吸收国际上菲史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开创我国菲史研究新局面的事业中稍尽绵薄。

注 释：

- [1] 见黎萨刊行的莫尔加书(1890年巴黎版)，第95页。转引自C.R.Boxer, "Some Aspects of Spanish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Philippines", in D.G.E. Hall(ed), "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1961, pp.200—212.
- [2]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p.1, xxiv. 参看上引 Boxer, "Some Aspects" 一文。
- [3] Juan de la Concepcion, "Historia general de Philipinas", 14vols., Manila, 1788—1792; 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 "Historia de las Islas Filipinas", Sampaloc, 1803.
- [4] 同注[1], 题词。
- [5] Jose Rizal, "Filipinas Dentro de Cien Anos", "La Solidaridad", Sept. 30, 1889—Feb. 1, 1890; Jose Rizal, "La Indolencia de los Filipinos", "La Solidaridad", July—Sept. 1890.
- [6] W.H.Scott, "Cracks in the Parchment Curtain".
- [7] Renato Constantino, "The Philippines: A Past Revisited", Manila, 1975, p.1.
- [8] J. 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the Hague, 1955, p.290.
- [9] G.F. Zaide,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Vol. II, p.322(Manila, 1957).

- [10] 池端雪浦等:《东南亚现代史》(日文),II,(东京山川出版社,1977)第156页。
- [11] Horatio de la Costa, "Background of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1961, p.23.
- [12] John A. Larkin, "The Place of Local History in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8 Sept. 1967, pp. 306—317.
- [13] 同注[12]。
- [14] 同注[7]。p.2.
- [15] 这是指Peter C. Smith等人的研究,见John A. Larkin(ed), "Perspectives on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A Symposium" (1979)中Smith所写文章。
- [16] Milagros C. Guerrero,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Elites of Luzon During the Revolution 1898—1902" in A. W. McCoy and Ed. C. de Jesus(ed), "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 Global Tr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1982, pp. 155—190. 按格雷罗此文是根据其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博士论文写成的,该论文未见。
- [17] Reynaldo Clemena Ileta, "Pasyon and Revolution", Manila, 1979. 池端雪浦的“圣约瑟信徒团的反乱”一文(收入1982年出版的铃木中正所编《千年王国的民众运动研究》一书中),其研究方向即与伊莱多相同。
- [18] 同注[12]。
- [19] Elizabeth Fox Genovese and Eugene Genovese,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Winter 1976, pp. 214—215. (转引自上举McCoy等编“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导言。))